

#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 ——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经验分析

李玉山<sup>1</sup> 卢敏<sup>2</sup> 朱冰洁<sup>3</sup>

**摘要：**贫困户脱贫后扶持政策暂时不变，昭示脱贫农户后期生计可持续发展应纳入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范畴。本文研究根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邻接民族地区脱贫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以综合测度的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为基础，研究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如何影响了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结果显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这一作用对脱贫边缘户的影响程度更大。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多样性、提高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增强其致富动能等途径来降低脱贫人口的生计脆弱性。此外，不同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差异，产业扶贫政策和混合型扶贫政策的影响最为突出，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的影响次之，随后是安居房工程政策，教育扶贫的政策效果尚不显著。

**关键词：**精准扶贫 扶贫政策 脱贫农户 生计脆弱性 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自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以来，中国政府启动了迄今世界上政策面最广、规模性最大的扶贫实验，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和划时代的脱贫成就（李芳华等，2020）。到2019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仅存551万，贫困发生率是0.6%，2020年末832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sup>①</sup>。需要明确的是，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并不代表贫困彻底消失，一些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脱贫人口生计可持续性长期处在脆弱和不稳定状态。针对脱贫群体的返贫风险，政府尽可能为其提供了一系列多元化、精准化、叠加式和选择性的政策组合。这些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不仅增加了脱贫群体的收入多样性，而且提升了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还增强了农户发展致富的动能（李小云等，2018；邢成举，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的长效保障机制研究”（编号：18BMZ149）和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项目“2020年后吉林省应对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编号：JL2020-003）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卢敏。

<sup>①</sup>资料来源：《全国832个贫困县实现全部“清零”》，<http://rmfp.people.com.cn/n1/2020/1123/c406725-31941481.html>。

2020; 魏后凯等, 2021), 为脱贫人口摆脱生计脆弱状态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后脱贫攻坚逐渐拉开帷幕, 在脱贫不脱政策视域下探寻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对理解与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巩固拓展扶贫政策成果、促进脱贫群体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有效落实精准扶贫政策, 降低贫困群体的生计脆弱性风险, 协同推进多元扶贫体系建设, 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政策法规。2011年,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重点支持连片特困地区, 因地制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 实行多元化的扶贫措施。2014年, 国务院出台《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 通过制定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政策, 引导和优化配置各类扶贫资源,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2015年, 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明确了五年7000万贫困人口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 对精准扶贫政策分类实施、监管落实及绩效考核等具体环节细化了制度安排。2016年, 国务院出台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区域整体推进相结合, 努力破解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瓶颈, 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奔小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引导农户光荣脱贫。2018年6月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重申坚持精准扶贫方略,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与优化扶贫政策供给结构, 筑牢贫困户稳固脱贫保障,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成效, 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座谈会上强调, 要牢牢把握精准扶贫和精准施策的综合要求, 扎实做好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生态扶贫等精准扶贫重点工作, 实现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sup>①</sup>。综上, 中国政府出台的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 从顶层设计到实践环节给扶贫工作做出了重要规划和指示, 体现了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叠加性、深入性和实践性。

现有关于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研究文献主要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精准扶贫政策与减贫效应的研究。王志章、韩佳丽(2017)指出精准扶贫政策可以有效减缓贫困, 立足于扶贫政策精准性, 实施多元化扶贫政策更能提升减贫效果。陈志等(2017)借助县域精准扶贫的实绩核查数据, 证实可持续的扶贫措施和较高的帮扶主体层级能够显著提升贫困户对扶贫效果的认可程度。王立勇、许明(2019)研究发现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有着明显的减贫效应, 且随着时间推移, 扶贫效果具有可持续性。李芳华等(2020)采用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 “十三五”精准扶贫政策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劳动供给与收入。尹志超、郭沛瑶(2021)认为实施精准扶贫政策能够聚焦深度贫困和精准发力, 大幅提升贫困家庭的生活质量。二是对不同扶贫政策与农户生计关系的研究。胡晗等(2018)研究发现, 产业扶贫政策提高了贫困户参与农业种植、畜禽养殖生计活动的比重, 但对经营商业和外出务工的影响不显著。龙彦亦、刘小珉(2019)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生计空间”进行了解读, 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在“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政策设计下, 应为扶贫政策构建施政基础以及尽可能选择适合农户的方式来助其脱贫。王振振、王立剑(2019)探讨了贫困户的精准识别问题, 揭示不同的精准扶贫措施对异质性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提升效应存在差异。王建(2020)认为实施教育扶贫政策是缓解多维贫困、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抵御贫困脆弱性和提

<sup>①</sup>习近平, 2020: 《在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 《求是》第9期。

升农户生计水平的重要途径。

既有文献从贫困群体视角较为深入、全面地解读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其提供的观点与结论为本文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然而，学者们对于脱贫农户这一政策对象的关注尚且不足，鲜有研究考察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以扶贫政策效应的评估为例，已有研究侧重于不同精准扶贫政策的单一化影响，能够回答贫困地区异质性扶贫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以及是否可以更好衔接的问题，但无法获得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整体层面的平均效应。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现有研究：第一，较为明晰地界定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同时立足于脱贫农户视角，以评估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效果为切入点，在分析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探究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如何通过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以及致富动能等渠道作用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第二，采用控制遗漏变量、多模型回归、聚类分析脱贫边缘户等方法测试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稳健性，并借助 Cutler and Lleras-Muney (2010) 渠道效应模型验证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三个渠道假说，以期丰富扶贫政策与贫困脆弱性机制研究的文献基础。第三，扶贫政策实施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为了严谨地评估多元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本文研究打破省级行政区划禁锢，更好地识别连片邻接区域扶贫政策与生计脆弱性的因果关系，以为脱贫农户生计干预政策的制订提供经验依据。本文研究还探讨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差异，以验证不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成效。

## 二、理论假说与研究设计

### (一) 理论假说

本文着眼于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与战略导向，通过梳理、对比和归纳既有文献，认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要义是多措并举以凝聚脱贫攻坚合力，围绕贫困群体的致贫因素和实际需求，靶向性地实施产业扶贫政策、教育扶贫政策、安居房工程政策、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以及混合型扶贫政策等多元化和多种类的组合政策。贫困群体不是孤立地盲目选择扶贫政策类型，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也不是片面和碎片化的，而是兼具协同性、关联性与互补性。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立足于脱贫攻坚战略全局，注重扶贫政策体系内部政策之间的侧重点、功能性和有序衔接，在准确识别帮扶对象的基础上，构建精准扶贫政策的合理化实施路径，旨在优化和提升辖区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实现贫困人口脱贫以及保障脱贫之后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是政府为破解贫困难题而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已有经验证据表明，其对农户脱贫维系生计可持续状态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例如，王志章、韩佳丽，2017；王振振、王立剑，2019）。由于民族贫困地区致贫因素复杂，农户长期规模性福利缺失，有效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需要匹配致贫因素多样化和多维度的特征。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对传统功能型扶贫开发政策再设计，能够瞄准当下脱贫群体需求，借助先进集成技术与高效的组织管理功能，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和降低扶贫成本，提升扶贫政策实施质量和增进脱贫农户福祉。理论上，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可以最大程度上将扶贫资源精准匹配到民族贫困地区及脱贫群体之中，在增加扶贫资金供给的同时也有效激发了脱贫农户内生动能，

逐步积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生计资本（李小云等，2019），起到政策扶贫、资源要素与社会网络深度融合的综合效果，从根本上减少脱贫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与协同配合下，多元精准扶贫政策聚焦于农户个人与家庭的扶持救助、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能够解决政策边际效益下降、异质性偏好、信息不对称等挑战（李芳华等，2020；邢成举，2020），营造良好的扶贫环境来降低脱贫群体生计脆弱性。

对于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是如何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现有文献的诠释还相对薄弱，根据本文的文献回溯可以定性地归纳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可能通过增加收入多样性、提高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增强农户致富动能等渠道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产生制约作用。

关于收入多样性。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贫困地区的农户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脱贫人口收入渠道不断拓宽，有着较高的政策性收入比例（温铁军等，2021）。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是政府出台的立足多方面扶贫端口的政策集，基于产业合作、信贷援助转移支付、股息红利、异地就业、现金补贴等方式，增添了脱贫群体收入多样性的渠道，进而提升其生计可持续能力。对于脱贫农户来说，农林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外出务工、产业分红收入、子女汇款、家庭经营性收入、银行存款利息、土地流转收入、政府补助等多样化的收入模式并非同质，而是随着扶贫政策的推进不断调整变化。产业扶贫政策可以创造农业、非农业的就业机会，通过培育产业优势和特色品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稳定产业扶贫对带动就业、增加收入的持续效应。融合了种养、务工以及其他特色经营模式的综合产业合作方式有助于脱贫人口获得核心禀赋收益（王丽纳、李玉山，2019）。外出务工有利于优化农村劳动力的资源配置，通过“干中学”效应提升脱贫人口素质，劳动力转移也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促使扶贫项目更加多元化，如区别于孟加拉国 BRAC（Bangladesh Rehabilitation Assistance Committee）等国际项目，中国政府除了提供农业生产性资产之外，还供给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产业资产，通过实施危房改造、易地搬迁、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等政策以期改善农户的生存、就业和增收条件。农户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扶贫政策，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扶贫资源供需结构，促进政府将扶贫资源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有助于实现扶贫资源的帕累托改进，这反过来也强化了政府持续推进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动力和决心。脱贫人口收入方式多样化及其动态调整较大程度上提高了生计可持续性的质量，使之避免遭受风险冲击而拥有更为持久的保障能力，从而降低了生计脆弱性水平。

关于政府信任度。实施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强化了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助于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毋庸置疑，政府是扶贫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形象代言人，脱贫人口对政府的信任更多源于双方的接触与交流。精准扶贫系国家重大政治方略，其多元化扶贫政策的深入实施促进了农户与政府间的合作信任。理论上，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一是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体现了较好的公平性，会强化脱贫群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平等权利以及权利和分配之间的矛盾是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阿玛蒂亚·森，2019），中国政府推进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基础是让农户享受到扶贫资源、脱贫政策优惠等权利。值得指出的是，低保、兜底、教育补贴、医疗保障等政策享受条件除贫困户以外，还包括已脱贫但仍享受扶贫政策的农户。政府推行多元精准

扶贫政策，对贫困户和脱贫农户一视同仁的做法大幅提升了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二是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体现的科学性会强化脱贫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是推进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充分体现了群众性、创新性和科学性。与传统的广撒网式扶贫模式相比，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的建档立卡、群众评议、宣传公示、动态核验、第三方评估等程序，形式、流程和工作机制都更加规范。丁从明等（2019）指出，农户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越高，参与政府推行的公共政策的可能性越大。扶贫政策的成功实践印证了中国政府自身政策选择的正确性和政府作用的重要价值，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政府信任水平。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不仅为脱贫农户提供较多收入的物质福利效应，还会促进消费经济带来的心理福利效应（Banerjee et al., 2015），因而更能降低生计脆弱性水平。

关于致富动能。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通过增强农户的致富动能降低了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理论上，个体动能源自对外界环境信息的综合评价和感知行为偏好，以及通过信息接收与处理机制形成心理认识、主观感受和内生动力，动能是产生个体行为的先决条件（Ajzen, 1991；于婷、于法稳，2019）。实施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会对脱贫农户本身和整体外部环境产生影响，包括强化农户个体发展能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以及获得更多政策推广的主观感知（李小云等，2019），进而瞄准时机参与精准扶贫。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相继出台、贯彻落实以及合理的衔接机制，将脱贫农户的关注点、注意力和行动决策逐步引向强化致富动能的状态，激励脱贫群体去积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并不断调整和优化各类资本结构，从而对维持脱贫农户的长远生计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政策执行而言，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发生在中央、地方政府、脱贫农户等多个层级与主体之间，政府上传下达、令行禁止的扶贫政策执行力，决定了脱贫群体的行动取向。民主参与满足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可获得性扶贫资源的增多也强化了农户的致富发展动能（卢敏等，2011）。政府为推行政策方案和完成政策目标运用了诸多政策方法和手段，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基层政府的事权以及对农户的政策激励有效提升了政策执行力，将脱贫人口参与多元精准扶贫提升到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程度（吴比等，2016；王亚华、舒全峰，2021），极大地强化了其发展致富动能。考虑到民族地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有着一定的颁布密度和持续性，政策执行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脱贫人口的利益权衡为农户降低生计脆弱性提供了充分的内生动能，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脱贫农户的致富动能以维系良好的生计可持续状态，因而，致富动能是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作用渠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抑制作用，且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提高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强化其致富动能等渠道和机制实现的。

## （二）研究设计

在 Chaudhuri et al.（2002）、宁静等（2018）以及李芳华等（2020）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研究设定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基准模型如下：

$$Livulner_i = \lambda_0 + \lambda_1 Mulpolicy_i + \lambda_2 Trol_i + \lambda_3 Prov_i + \varepsilon_i \quad (1)$$

（1）式中，下标*i*为脱贫农户个体标识，*Livulner<sub>i</sub>*代表脱贫农户*i*的生计脆弱性水平，*Mulpolicy<sub>i</sub>*代表样本个体*i*享受的多元精准扶贫政策，*Trol<sub>i</sub>*代表样本个体、村落特征等系列控制变量，*Prov<sub>i</sub>*代

表毗邻民族区域的省区效应,  $\varepsilon_i$  代表残差项。为了准确估计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效应, 需要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测量偏误、互为因果及遗漏变量等问题予以考察。由于脱贫农户数据和选取的驱动变量可能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 本文设定哑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二分转换后进行检验, 能够较大程度上减少测量误差的干扰。在时间顺序上实施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在前, 脱贫农户生计水平发生改变在后,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是政府主导行为, 通常不会因为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了此前实施的扶贫政策, 因而本文并不存在十分明确的反向因果路径。针对遗漏变量问题, 本文尽量控制了一系列农户个体、村级和省区变量, 但理论上仍可能存在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 因而本文从较为丰富的数据信息中尽可能地提取影响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潜在指标, 来减少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现阶段绝对贫困人口已过渡为相对贫困群体, 实际上仍有较多的脱贫边缘户或不稳定脱贫户应对风险能力较弱, 农户脱贫后可能返贫。本文运用 K 均值聚类方法区分出高脆弱性脱贫户 (脱贫边缘户) 和低脆弱性脱贫户, 着力对脱贫不稳定的边缘农户进行经验考察。

(1) 式中,  $\lambda_1$  表征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总体效应, 其中包含了实施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直接影响, 也涵盖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各种渠道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形成的间接影响。本文研究借鉴 Cutler and Lleras-Muney (2010) 的研究思路, 在 (1) 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上文重点阐述的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以及致富动能等渠道变量, 来考察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 具体构建如下模型:

$$Livulner_i = \mu_0 + \mu_1 Mulpolicy_i + \mu_2 Channel_i + \mu_3 Trol_i + \mu_4 Prov_i + \tau_i \quad (2)$$

(2) 式中除了增加渠道变量  $Channel_i$  以外, 其余设定同 (1) 式。该模型考察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影响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以及致富动能作用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研究假说。模型 (1) 和 (2) 回归后得到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估计系数  $\hat{\lambda}_1$  和  $\hat{\mu}_1$ 。那么, 如何测量  $Channel_i$  在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中的渠道效应呢? 考虑到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Livulner_i$  (简作  $L_i$ ) 是多元精准扶贫政策  $Mulpolicy_i$  (简作  $M_i$ ) 和渠道变量  $Channel_i$  (简作  $C_i$ ) 的函数, 且  $Channel_i$  是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途径, 则  $L_i = f(M_i, C_i(M_i))$ , 将该式两端对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变量求导可得  $dL_i/dM_i = \partial f/\partial M_i + (\partial f/\partial C_i) \cdot (\partial C_i/\partial M_i)$ 。为便于推导, 暂不考虑模型 (2) 中的控制变量, 那么  $(C_i|1, M_i)$  的一个线性投影是  $\delta_0 + \delta_1 M_i$ , 即有  $C_i = \delta_0 + \delta_1 M_i + r_i$ 。将该式代入不含控制变量的模型 (2) 可得:

$$Livulner_i = (\mu_0 + \mu_2^* \delta_0) + (\mu_1 + \mu_2^* \delta_1) Mulpolicy_i + (\mu_2^* r_i + \tau_i^*) \quad (3)$$

进一步, 用  $L_i$  对于  $(1, M_i)$  进行回归的模型为  $L_i = \lambda_0 + \lambda_1 M_i + \varepsilon_i^*$ 。相较于模型 (3) 可知  $\lambda_1 = P \lim \hat{\lambda}_1 = \mu_1 + \mu_2^* \delta_1$ ,  $\mu_2^*$  是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关于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以及致富动能等渠道变量的偏导数  $\partial f/\partial C_i$ ,  $\delta_1$  是渠道变量关于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偏导数  $\partial C_i/\partial M_i$ , 所以  $\lambda_1$  既包括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直接影响效应  $\mu_1$ , 也包括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通过渠道变量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间接影响效应  $(\partial f/\partial C_i) \cdot (\partial C_i/\partial M_i)$ 。模型 (2) 对渠道变量进行了控制, 上述间接影响能够从  $\lambda_1$  中分离, 因而  $\hat{\lambda}_1 - \hat{\mu}_1$  是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关系中渠道

效应  $\lambda_1 - \mu_1 = \mu_2^* \delta_1$  的一个估计, 不考虑基值影响的渠道效应相对量为  $(\hat{\lambda}_1 - \hat{\mu}_1) / \hat{\lambda}_1 = 1 - \hat{\mu}_1 / \hat{\lambda}_1$ 。本文中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是前置条件, 渠道变量能够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形成影响, 却不会影响政府主导的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 模型 (1) 未对渠道变量进行控制并不会造成显著的遗漏变量偏差。最后,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考察单一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效应, 并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不同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差异。

### 三、数据采集与指标说明

#### (一) 数据采集

本文研究所采用数据来自课题组对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贵州省地理毗连区脱贫群体的实地入户调查。湘鄂渝黔邻接区域处于武陵山连片深贫区腹地, 属于农村经济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复合地区, 有 19 个民族自治县 (县), 居住着苗族、侗族、土家族、仡佬族、布依族等 30 多个少数民族居民。该地区致贫因素复杂, 深度贫困问题凸显, 众多“脱贫摘帽”农户生计水平偏低, 面临着较高的返贫风险, 是政府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长期输出地, 以该地区脱贫户为考察对象研究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生计可持续效应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由于各省份不同阶段的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人口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及致富动能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这种差异会进一步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为了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毗邻民族地区多元精准扶贫实施的政策效应, 课题组遵循科学性、切实性和可获得性原则, 基于随机抽样的方法采集考察区域的样本数据。2018 年 7 月以来, 课题组历时近两年先后 4 批次对位于湖南省龙山县和凤凰县 7 个村, 湖北省利川市 5 个村, 重庆市彭水县、酉阳县和秀山县 11 个村以及贵州省印江县和江口县 7 个村的 378 户脱贫农户展开了问卷调查, 除了清理离群值和回答不完整的问卷之外, 实际获取有效问卷 350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2.59%。样本村及脱贫农户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 课题组预先参考了四省 (市) 相关区 (县) 的脱贫农户名单, 并在样本村 (社区) 中随机抽取脱贫农户进行实地探访。由于调查过程受到脱贫农户进城务工、因病住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各考察村 (社区) 的调查问卷数量存在差异。调查问卷的内容涵盖脱贫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情况、生计资本 (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情况、生计风险情况、经济促进措施、政策保障及评价情况等。调查问卷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09, 结构变量 Kaiser-Meyer-Olkin 值是 0.723, 满足判别条件与研究标准, 表明问卷的信度水平和结构效度较为合理。

表 1 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分布情况

样本省份	样本市县	样本镇 (乡) 村	脱贫农户 (户)	占比 (%)
湖南省	凤凰县	禾库镇龙角村、禾库社区、崇寨村	42	12.00
	龙山县	石羔街道白泥社区、永兴社区、英家社区、石羔社区	37	10.57
湖北省	利川市	汪营镇甘泉村、双岭村、十户场村、皂角岭村; 柏杨镇太阳村	54	15.43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重庆市	彭水县	靛水街道肖坝村、古文村；高谷镇狮子社区、铜鼓村；鹿鸣乡万年村、龙田村、庞溪村	79	22.57
	酉阳县	楠木乡红庄村、红星村	38	10.86
	秀山县	隘口镇平所村、富裕村	28	8.00
贵州省	印江县	紫薇镇大园子村；郎溪镇三村村；新寨镇团山村；木黄镇凤仪村	27	7.71
	江口县	德旺乡净河村；双江镇黑岩村；怒溪镇河口村	45	12.86
合计	——	——	350	100.00

## (二) 指标说明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纵观脆弱性研究的现有文献，由于研究背景、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学界对脆弱性的内涵界定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认为脆弱性与灾害冲击、危险程度、贫困恢复力以及可行能力等要素密切相关 (Chaudhuri et al., 2002; Adger, 2006)。以此为基础，学者们将生计脆弱性诠释为农户个体在追求生计实现与可持续过程中，面临生计结构变化和外力冲击时呈现出非均衡的易受损状态 (Zhang and Wan, 2006; 宁静等, 2018)。既有研究多采用综合评价法和函数模型法测度生计脆弱性水平，本文参考 Hahn et al. (2009) 的研究，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定量测算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标  $Livulner_i$ 。首先依托于暴露水平  $Exps_i$ 、敏感程度  $Sens_i$ 、适应能力  $Adap_i$  的脆弱性框架和可持续生计框架 (Adger, 2006)，探寻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多维因素，并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得分，其次利用函数模型法设定模型来测算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Livulner_i = (Exps_i - Adap_i) \times Sens_i$ 。生计脆弱性指标反映的是一种趋势的相对量，指标为负说明农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因此负数绝对值越大，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越高。

调查发现，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主要受到自然风险、家庭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因素的干扰，即暴露水平  $Exps_i$ 。由于自然灾害频率与距市（县）中心距离可以表征农户受自然风险干扰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子女教育费用作为家庭承担的一项重要支出增加了贫困风险，农业年收入比重降低代表农业有演变为弱势产业以及农户面临较高社会风险的趋势，因而本文选取上述四个指标衡量暴露水平。敏感程度  $Sens_i$  是指脱贫群体易受到健康风险等因素的冲击进而产生消极影响 (李玉山、陆远权, 2020)。一般而言，脱贫户家中有残疾人、大病亟待治疗人员或者主要劳动力健康状况差，其更需要承担繁重的家庭负担，对风险也有更高的敏感性，因而本文选取家中是否有残疾人、是否有大病治疗人员和劳动力健康状况反映敏感程度。适应能力  $Adap_i$  意含脱贫人口对危害扰动的抵抗力、响应力与恢复力，通常用五种生计资本表征。较高的自然资本（用农地质量、耕地和林地面积表征）意味着农户高产获益的机会较大；物质资本（用住房类型、面积和畜禽养殖表征）较高对应着较多的生活和生产投入；人力资本（用劳动力年龄、数量及受教育程度表征）较高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金融资本（用家庭年收入、存欠款和政府补助表征）越高蕴含其在降低生计脆弱性时扮演的角色越重要；社会资本（用亲友职业、保障政策和帮扶人员类别表征）较高说明农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网络与非正式保障，抵御风险能力也较强。具体指标如表 2 所示。

指标层	指标含义	权重
自然风险	自然灾害频率, 未发生=0.2, 少发生=0.3, 常发生=0.4	0.0439
	距市(县)中心距离(千米)	0.0445
家庭风险	是否承担子女教育费用, 是=1, 否=0	0.0388
社会风险	农业年收入占家庭年收入比重	0.0406
健康风险	是否有残疾人, 是=1, 否=0	0.0389
	是否有大病治疗情况, 是=1, 否=0	0.0397
	劳动力健康状况, 较好=0.2, 一般=0.3, 较差=0.5	0.0399
自然资本	农地质量, 无农地=0, 较差=0.2, 一般=0.3, 较好=0.5	0.0388
	耕地面积(亩)	0.0398
	林地面积(亩)	0.0415
物质资本	住房类型, 土木房=0.1, 土砖房=0.2, 砖瓦房=0.3, 混凝土房=0.4	0.0373
	生活耐用品, 无=0, 电视/冰箱=0.1, 洗衣机/手机=0.2, 其他=0.3	0.0393
	住房面积(平方米), 100及以下=0.1, 100~200(含200)=0.2, 200~300(含300)=0.3, 300以上=0.4	0.0394
	畜禽养殖情况, 无=0, 鸡/鸭/鹅=0.1, 羊/猪=0.15, 牛/马/驴=0.2, 前三种分三档: 10只及以下、11~20只(含20只)、20只以上, 后五种分三档: 2只及以下、3~4只(含4只)、4只以上, 分别乘以0.2/0.3/0.5	0.0399
人力资本	户主年龄, 男, 60岁及以上=0.2, 40~60岁(含40岁)=0.3, 18~40岁(含18岁)=0.5; 女, 55岁及以上=0.2, 40~55岁(含40岁)=0.3, 18~40岁(含18岁)=0.5	0.0404
	劳动力平均年龄, 60岁及以上=0.2, 40~60岁(含40岁)=0.3, 18~40岁(含18岁)=0.5	0.0395
	成年劳动力数量, 无=0, 1人=0.1, 2人=0.2, 3人=0.3, 4人及以上=0.4	0.039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1, 初中=0.2, 高中=0.3, 大专及以上=0.4	0.0396
金融资本	家庭年收入(元), 1万及以下=0.1, 1~3万(含3万)=0.2, 3~5万(含5万)=0.3, 5万以上=0.4	0.0388
	家庭存款(元), 1万及以下=0.1, 1~3万(含3万)=0.2, 3~5万(含5万)=0.3, 5万以上=0.4	0.0385
	家庭欠款(元), 1万及以下=0.4, 1~3万(含3万)=0.3, 3~5万(含5万)=0.2, 5万以上=0.1	0.0409
	政府补助(元)	0.0387
社会资本	亲友的职业类型, 无=0, 务农=0.1, 教育或医疗=0.2, 经商或政府工作=0.3	0.0391
	是否贯彻落实社会保障政策, 是=1, 否=0	0.0421
	哪些从业者提供了帮扶, 无=0, 务农=0.1, 教育或医疗=0.2, 经商或政府工作=0.3	0.0403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衡量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内容, 包含精准性和多元化两个方面。与贫困农户不同, 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人口来说

有着较好的“精准”属性。一是脱贫农户是根据帮扶人制度和村民大会投票产生，这一制度优势下农户的收入、政策参与意愿等私人信息会被频繁入户的帮扶人观察到，同时中国农村是人情社会，脱贫人口彼此间能够相互体察并传播彼此信息（李芳华等，2020）<sup>①</sup>。二是脱贫农户均为建档立卡群体<sup>②</sup>，政府建档立卡旨在充分识别和了解农户的多维贫困特征，其工作机制上要求当地扶贫干部主动与该户实质接触，并开展大量扶贫活动和社会互动（李小云等，2018）<sup>③</sup>。在掌控和尊重建档立卡户内在脱贫需求情况下，因时因地因人施策，以保障脱贫农户的政策需求与所参与的脱贫政策相一致，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扶贫政策精准度。进一步，问卷设置了问题：“您目前享受了哪些精准扶贫政策？”该多选题问题为本文进行多元化政策评估提供了契机。王志章、韩佳丽（2017）认为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帮扶过程中，脱贫农户所享受的政策越多，则多元化程度越高，本文借鉴该研究将精准扶贫政策的多元化取值范围设定 0 到 5 的取值区间。

3.渠道变量。（1）收入多样性。实施多元扶贫政策有助于探索多种可靠的收入来源途径，尤其对于生活在民族贫困山区的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程度越高，脱贫群体的生活越有保障。如果脱贫农户某一项收入渠道受阻，其他收入可以进行及时弥补，从而尽可能地降低收入损失。本文借鉴 Wuepper et al.（2018）的研究方法，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测度脱贫农户收入多样性，具体计算式为

$$Incdiver_i = \sum_{n=1}^N (Ratio_{i,n})^2$$
，其中  $Ratio_{i,n}$  是将脱贫农户收入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农业收入、非农业经营收入、政府转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其他新业态收入后计算的各项收入在全部收入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农户收入多样性程度越高意味着其专业化程度越低，该指数数值越趋于零。虑及思维习惯，本文使用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1 - Incdiver_i$  来具体反映收入多样性，估计时设置 0—1 变量，如果

$1 - Incdiver_i$  大于  $1 - \overline{Incdiver_i}$ ，脱贫农户具有多样化收入方式，取值为 1，反之取 0。（2）政府信任度。农户对政府的信任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执行和实施政策的绩效是否符合并满足社会公众的预期（刘米娜、杜俊荣，2013；Miller and Listhaug, 1990），本文借鉴 Erikson（1991）等的研究，将脱贫农户对政府执行政策程序的评价和实施政策的满意程度表示为政府信任度。（3）致富动能。调查问卷政策保障部分对“您脱贫后的下一步发展有何打算”问题采取了独立、平行方式的发问，并将备选答案“继续依靠政府的帮扶”“立足自我发展，但仍需要一定的政府帮扶”和“自力更生，勤劳致富”进行赋分来表征脱贫农户的致富动能。

<sup>①</sup>通过村民大会、群众互评方式产生的脱贫农户，信息完全的情况下难以通过谎报、欺骗等手段获得政策优待；脱贫不撤档、脱贫不脱政策则能够充分保证脱贫人口拥有已参与并满足自我意愿的福利政策。

<sup>②</sup>政府建立了“建档立卡”群体贫困人口追踪调查数据库，由基层干部动态排查农户状况并登录数据，在“插花式”分布的毗邻民族地区，建档立卡户可以有效规避农户难识别、瞄准错误率高等扶贫精准性的困扰（李小云等，2019）。

<sup>③</sup>建立第一书记与帮扶人工作队伍，实时核查、更新农户信息，洞悉农户的致贫原因和需求以提供精准帮扶，目的是为建档立卡户量身定制精准扶贫产品或举措。

4. 控制变量。为了有效控制其余因素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参考杨文等（2012）、宁静等（2018）以及胡晗等（2018）的研究，本文选取了性别、脱贫时间、选择的医疗机构、农业生产工具、村庄规模、参与商业保险、海拔、民族特征、道路基础设施以及政策执行力度 10 个控制变量，指标选取详见表 3。

## 四、实证分析

### （一）统计特征

表 3 列示了整体脱贫人口样本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在整体样本中，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值平均为-0.73，标准差为 0.74，极值区间是-5.25 到 0.70，采样区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最小值出现在重庆市彭水县肖坝村，最大值则为湖南省凤凰县禾库社区。本文测算的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变量均值为 1.84，标准差为 0.87，说明脱贫农户普遍选择了 1 种以上精准扶贫政策。对于单一化的精准扶贫政策而言，其他混合型扶贫政策和教育扶贫政策的均值较高，分别为 0.49 和 0.48，平均数高于安居房工程政策的 0.37、产业扶贫政策的 0.17 以及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的 0.11。19.71%的脱贫群体是高脆弱性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均值是 0.15，脱贫农户的收入多样性程度偏低。政府信任度的均值是 2.39，说明脱贫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87.14%的脱贫农户有较强的发展致富动能，仅有 12.86%的农户选择继续依赖政府扶持。考察样本 8 个维度的关注变量中，农户脱贫时间的均值是 2.03，一年以内脱贫的农户最多，占比 42.29%，脱贫时间为一年到两年、两年到三年的农户基本持平，10.29%的农户脱贫时间为三年以上，农户脱贫时间的标准差是 1.04，相比较来说显示了较大的样本间差异。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由表 2 构成要素测算综合评价值	-0.73	0.74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	享受的精准扶贫政策，赋值 0~5，数值越大，享受扶贫政策越多	1.84	0.87
产业扶贫政策	是否享受产业扶贫政策，是=1，否=0	0.17	0.38
教育扶贫政策	是否享受教育扶贫政策，是=1，否=0	0.48	0.50
安居房工程政策	是否享受安居房工程政策，是=1，否=0	0.37	0.48
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	是否享受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是=1，否=0	0.11	0.31
混合型扶贫政策	是否享受其他混合型扶贫政策，是=1，否=0	0.49	0.50
性别	男=1，女=0	0.53	0.49
农户脱贫时间	一年以内=1，一年到两年=2，两年到三年=3，三年以上=4	2.03	1.04
医疗机构选择	看病时选择的医疗机构，村/社区卫生所=1，乡镇医院=2，县级医院=3，县级以上医院=4	2.13	0.86
农业生产工具	无=0，猪草机/打面机=0.1，插秧机/耕地机=0.2，其他=0.4，多选相加	0.16	0.17
村庄规模	社区村庄人口数量，取对数	7.50	0.48
参与商业保险	是=1，否=0	0.04	0.19
海拔	村落平均海拔，取对数	6.76	0.31

民族特征	少数民族=1, 汉族=0	0.80	0.40
道路基础设施	是否村镇道路户户通, 是=1, 否=0	0.86	0.34
政策执行力度	政策重视及落实情况, 不到位=1, 一般=2, 到位=3	2.51	0.68
收入多样性	收入多样性水平高=1, 多样性水平低=0	0.15	0.36
政府信任度	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评价范围 0~3, 分值越大, 信任程度越高	2.39	0.65
致富动能	继续依赖政府的帮扶=1, 立足自我发展、但仍需要一定的政府帮扶=2,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3	2.26	0.71

本文还对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分析<sup>①</sup>, 结果表明, 全样本中两者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 $p < 0.01$ ), 这意味着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其生计脆弱性水平越低,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有抑制作用。分地区层面上除湖北省以外, 湖南省、重庆市和贵州省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之间至少在 10%的水平上显示了与全样本一致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印证了上文的理论预期。

## (二) 总体影响

表 4 汇报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1) 列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 OLS 估计结果,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 列纳入了影响脱贫群体生计脆弱性的控制性变量, 结果仍支持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降低生计脆弱性的有效性。

(3) 列进一步控制了省区效应,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估计结果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平均提高一个标准差, 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水平降低约 22.22% ( $0.189 \times 0.87 / 0.74$ )。为了规避核心变量指标恒定可能引起的伪回归, 本文借鉴 Günther and Hartgen (2009) 有关脆弱性分层研究的做法, 将因变量转换为二分变量, 脱贫农户脆弱性均值以上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并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检验, (4) 列结果显示,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在 5%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值为负。

尽管本文控制了脱贫农户个体、家庭地区特征等变量, 然而仍可能存在一些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导致内生性问题, 因而本文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法破解内生性问题。参考 Ellis et al. (2017) 构造工具变量的做法, 本文以同一村落或社区内其他脱贫农户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指标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村落或社区内农户间联系紧密, 不存在距离和制度障碍, 其他脱贫群体参加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项目会通过拓业增收、享受政策红利以及人居环境改善等对该脱贫农户产生影响, 而其他脱贫农户享受的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并不直接影响该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水平, 这契合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生性的内在要求。

表 4 中, (5) 列报告了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进行估计的最终结果, Hausman 检验结果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 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运用 DWH 检验在 1%显著性水平上推断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是一个内生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高度相关, 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第一阶段估计的 F 值为 26.43, 大于 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而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充分”的原假设, 表明工具变量法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5) 列显示,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显著地抑制了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可见实施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有效满足了毗邻民

<sup>①</sup>由于篇幅原因, 相关性分析结果未在文章中呈现。

族地区脱贫群体的现实需求，有利于破解农户生计脆弱性水平较低的短期均衡问题。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OLS	OLS	OLS	Logit	2SLS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	-0.180*** (-3.685)	-0.197*** (-3.226)	-0.189*** (-3.048)	-0.298** (-2.131)	-0.412** (-2.507)
性别	—	0.043 (0.515)	0.040 (0.373)	-0.032 (-0.134)	0.048 (0.447)
脱贫时间	—	-0.130** (-2.185)	-0.127** (-2.039)	-0.202 (-1.405)	-0.159* (-1.732)
选择医疗机构	—	0.051 (0.794)	0.035 (0.658)	0.419*** (3.304)	0.080 (1.417)
农业生产工具	—	0.142 (0.603)	0.139 (0.512)	-0.079 (-0.128)	0.147** (2.325)
村庄规模	—	-0.170** (-2.504)	-0.155** (-2.361)	0.140 (0.530)	-0.134* (-1.926)
商业保险	—	-0.371 (-1.165)	-0.335 (-1.082)	-0.676 (-0.969)	-0.490 (-1.532)
海拔	—	0.218** (1.996)	0.202** (2.121)	0.079 (1.197)	0.039 (1.196)
常数项	0.293** (2.417)	-0.011 (-0.055)	0.035 (0.174)	0.287 (0.642)	0.329 (1.377)
地区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样本数	350	350	350	350	350
Pseudo R <sup>2</sup> 值	—	—	—	0.107	—
R <sup>2</sup> 值	0.018	0.064	0.115	—	0.109

注：\*、\*\*、\*\*\*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 t 值。

### (三) 稳健性检验

遗漏变量问题是因果识别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考虑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实施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民族特征、道路基础设施以及政策执行力度，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民族变量的估计系数基本为正值，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脱贫群体生计脆弱性水平与邻接地区民族人口构成紧密关联，区域内较高比重的少数民族聚落，伴随着较高的生计脆弱性风险。湘鄂渝黔毗邻区域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人口占比高达 48.90%。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物质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同，通常具有特定的族群属性。民族地区的贫困是一种经济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缺乏外力的介入与引导，这种贫困文化会持久地传承和形塑农户人格特征，从而造成贫困代际传递。本文估计结果显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较大程度上促使脱贫农户生计形成了逆脆弱性的新常态，虑及不同民族差异化、政策倾斜性程度和贫困代

际传递的长期性，显著的制约效应仍需要持续不断地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推向纵深。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加速器，会通过改善农户务工、生活和生产条件，促使脱贫群体获益以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李玉山、陆远权，2020）。这是因为道路基础设施不仅可以缩短交通时间，推动脱贫人口高效地实现劳动力就业转移，而且能够降低物流成本，有利于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开拓农村市场，还减少了农户购买物质生产资料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表5（2）列、（4）列和（5）列的估计结果中，本文引入道路基础设施指标。结果发现，关键解释变量仍然保持在至少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扶贫政策执行力度与质量直接决定了扶贫政策效果，进而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吴比等，2016）。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力度加大意味着政府会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力促政策匹配、行政监督干预、纠正执行偏差、公众参与互动等以保障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因而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力度越大，对脱贫群体生计脆弱性的抑制作用也越强。本文设定政策执行力度指标，并将其纳入表5（3）列和（5）列的回归中。估计结果显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值分别为-0.183和-0.175。

为了确保结论可靠，本文运用BP（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重新测算生计脆弱性构成要素权重，继而合成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BP神经网络能够较好权衡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各构成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高度仿真功能反复学习修正或减少隐性变量偏差。本文基于自然风险、家庭风险、社会风险、健康风险以及自然、物质、人力、金融、社会五类资本等9个维度25个指标（见表2），对评价变量之间的未知关系进行系统辨识，借助神经网络科学推断指标权重系数。表5中，（6）列估计结果显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意义上为负值，更换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度量方式并未改变前文结论。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	-0.183*** (-2.935)	-0.185*** (-2.941)	-0.183*** (-2.933)	-0.181*** (-2.850)	-0.175*** (-2.748)	-0.056** (-2.120)
民族特征	0.112* (1.824)	—	—	0.109* (1.765)	0.116 (1.629)	—
道路基础设施	—	-0.060** (-2.366)	—	-0.048** (-2.203)	-0.033* (-1.910)	—
政策执行力度	—	—	-0.143*** (-2.582)	—	-0.147** (-2.513)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50	350	350	350	350	350
R <sup>2</sup> 值	0.118	0.116	0.117	0.119	0.126	0.102

注：\*、\*\*、\*\*\*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t值。

#### （四）考虑脱贫边缘户

精准扶贫推动了绝对贫困人口向相对贫困群体过渡，与之相伴的是会出现一些新群体和新情况，一些农户已达到国家基本脱贫条件，但仍游离在贫困边缘，也就是边缘化脱贫群体可能会在过渡期大量存在。多数脱贫边缘户曾长期受到精准扶贫政策和扶贫干部的特别关注，随着“后 2020”时期扶贫工作启动仍可能再次成为破除相对贫困的关注焦点（左停等，2020）。考虑到扶贫政策效应具有分层性，即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效应存有差异，因而重视对贫困边缘人口的关注及其帮扶政策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甚至消除贫困边缘人口与低脆弱水平农户之间的帮扶政策落差，也有助于脱贫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农户。为了加深对于未来农村相对贫困边缘人群问题的认识，借鉴各地贫困边缘人口预防脱贫的经验，本文定量考察脱贫脆弱户的异质性状态。关于脱贫边缘户的界定，本文基于前文测算的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运用 K 均值聚类分析将调查样本划分为高低两个类别，其中数值小于-0.32 为生计脆弱性较低的脱贫农户，共计 281 人，占有较大的比重值 80.29%；数值大于-0.32 为生计脆弱性较高的脱贫农户，即本文描述的脱贫边缘户，该部分农户共计 69 人，占比 19.71%。聚类效果的方差分析显示，分类变量的显著性 p 值为 0.00，聚类效果较为理想。对聚类后分组样本进行计量检验可知（见表 6），与低脆弱性脱贫农户相比，回归（1）中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在脱贫边缘户中的影响系数为负值（-0.308），这表明在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程度相近的区域，脱贫边缘群体生计脆弱性会受到较大程度的遏制。换言之，随着脱贫边缘户逐步转变为低脆弱水平群体，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其生计脆弱性形成的抑制效应会逐渐降低。原因可能在于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更大程度上影响了脱贫脆弱户对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的认知以及增进了致富动能，从而提高了其生计可持续水平。

表 6 考虑脱贫边缘户的估计结果

	回归（1）			回归（2）		
	回归系数	T值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T值	标准误差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	-0.308**	-2.294	0.134	-0.125**	-2.443	0.051
性别	-0.058	-0.166	0.349	-0.037	-1.336	0.028
脱贫时间	-0.344*	-1.733	0.198	-0.029*	-1.779	0.016
选择医疗机构	-0.449**	-2.565	0.175	0.059***	4.205	0.014
农业生产工具	0.707	0.814	0.869	-0.018	-0.245	0.073
村庄规模	-0.739**	-2.412	0.306	0.053	0.274	0.193
商业保险	-0.835	-0.847	0.986	-0.057	-0.694	0.082
海拔	0.788	1.529	0.515	-0.064**	-2.317	0.028
常数项	-0.565	-0.787	0.718	0.247***	4.774	0.052
地区效应		是			是	
样本数		69			281	
R <sup>2</sup> 值		0.212			0.096	

注：\*、\*\*、\*\*\*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 t 值。

### （五）影响渠道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可能通过提高农户收入多样性水平、强化农户对政府

的信任程度和增强其发展致富动能等渠道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产生抑制作用。这里进一步检验研究假说的渠道效应是否存在。本文借助模型(2)讨论各个渠道变量在解释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制约效应中的相对重要程度,首先考察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和致富动能三个渠道变量的影响。表7中,(1)列报告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收入多样性的OLS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在5%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提升了脱贫农户收入多样性水平。遵循同样的分析逻辑,本文发现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强化了脱贫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增强了其致富动能。考虑到政府信任度和致富动能为有序离散变量,本文又进行了有序Logit回归,结果如(3)列和(5)列所示。有序Logit回归结果显示前述结论仍然成立。

表7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渠道变量的影响

	收入多样性	政府信任度		致富动能	
	(1)	(2)	(3)	(4)	(5)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	0.015** (1.984)	0.018* (1.710)	0.103* (1.862)	0.066** (2.246)	0.296** (2.242)
性别	0.061** (2.084)	0.035 (0.483)	0.220 (0.214)	-0.044 (-0.866)	-0.207 (-0.898)
脱贫时间	0.044*** (2.597)	-0.038 (-0.885)	-0.239 (-0.380)	0.017* (1.675)	0.080* (1.689)
选择医疗机构	-0.029** (-2.006)	0.016 (0.449)	-0.200 (-0.397)	0.004 (0.170)	0.020 (0.172)
农业生产工具	-0.050 (-0.673)	0.041 (0.221)	0.185 (0.342)	-0.056 (-0.433)	-0.263 (-0.431)
村庄规模	0.002 (0.049)	-0.089 (-1.137)	1.501** (1.980)	0.050 (0.930)	0.227 (0.936)
商业保险	0.057 (0.671)	0.019 (0.587)	-2.665* (-1.830)	0.161 (1.095)	0.767 (1.118)
海拔	0.080 (1.621)	-0.281** (-2.274)	-3.635 (-1.100)	-0.337*** (-4.021)	-1.605*** (-3.914)
常数项	0.144*** (2.617)	1.598*** (11.581)	4.990** (2.518)	0.291*** (3.056)	-0.883** (-2.050)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50	350	350	350	350
Pseudo R <sup>2</sup> 值	—	—	0.167	—	0.128
R <sup>2</sup> 值	0.120	0.112	—	0.141	—

注: \*、\*\*、\*\*\*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t值。

表8报告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渠道的回归结果。为了便于比较,(1)列为没有纳入任何渠道变量的估计结果。(2)列至(4)列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引入收入多样性、

政府信任度和致富动能三个渠道变量，（5）列同时控制了三个渠道变量。如前文所述， $1 - \hat{\mu}_1 / \hat{\lambda}_1$  是增加相应的渠道变量后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系数的下降幅度，也就是该渠道变量在解释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制约效应中所占的比重。对民族地区脱贫农户来说，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和致富动能在解释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抑制影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个变量共同解释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影响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 20.11%。其中，收入多样性、政府信任度和致富动能的解释贡献度分别为 7.41%、4.76% 和 5.82%，由此可见，收入多样性是更为重要的影响渠道。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控制三类渠道变量所解释的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比重，并不等于三类渠道变量解释比例的直接线性相加的总和，这大抵因为三种渠道变量之间并非严格的独立关系，三个变量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作用，将渠道变量集对多元精准扶贫政策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之间关系的解释力提高了约 2.12%。以上分析显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通过提高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增强农户致富动能提升了脱贫人口的生计可持续水平，进而减少了其生计脆弱性，需要明确的是多元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增加收入多样性拓宽了农户的组合收入途径，更有助于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表 8 影响渠道的估计结果

	(1)	(2)	(3)	(4)	(5)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	-0.189*** (-3.048)	-0.175*** (-2.939)	-0.180*** (-3.018)	-0.178*** (-2.832)	-0.151*** (-2.663)
收入多样性	—	-0.563*** (-2.899)	—	—	-0.627*** (-3.232)
政府信任度	—	—	-0.138* (-1.764)	—	-0.152** (-1.968)
致富动能	—	—	—	-0.191* (-1.684)	-0.202* (-1.808)
渠道效应	—	7.41%	4.76%	5.82%	2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50	350	350	350	350
R <sup>2</sup> 值	0.115	0.122	0.121	0.119	0.137

注：\*、\*\*、\*\*\*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t值。

#### （六）影响差异：兼论扶贫政策成效的巩固与拓展

中国政府推行的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包括产业扶贫政策、教育扶贫政策、安居房工程政策、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以及混合型扶贫政策等，为脱贫群体提供了所有可能远离贫困的路径。实施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显著减少了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问题上文已得到验证。由于扶贫政策的成本性、风险性及其不确定性等因素，不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对该问题展开分析，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异质性影响，在巩固与拓展

精准扶贫政策成效方面也具有指导价值。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无偏和一致性,本文首先对产业扶贫政策、教育扶贫政策、安居房工程政策、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以及混合型扶贫政策等单一化政策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的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精准扶贫政策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text{①}}$ ,表明五种精准扶贫政策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9分别报告了不同扶贫政策的线性模型估计结果和Logit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系数基本为负值,其中,产业扶贫政策、安居房工程政策、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以及混合型扶贫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产生了抑制作用,而教育扶贫政策的影响效果还不显著。不同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差异显示扶贫政策有异质性影响。

表9 不同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差异的估计结果

	OLS回归			Logit回归		
	回归系数	T 值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T 值	标准误差
产业扶贫政策	-0.306**	-1.970	0.155	-0.314*	-1.819	0.173
教育扶贫政策	0.242	1.211	0.200	0.050	0.021	2.381
安居房工程政策	-0.222*	-1.901	0.117	-0.265	-1.583	0.167
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	-0.241	-1.330	0.181	-0.458*	-1.662	0.276
混合型扶贫政策	-0.378**	-2.182	0.173	-0.880***	-3.279	0.268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样本数		350			350	
Pseudo R <sup>2</sup> 值		—			0.138	
R <sup>2</sup> 值		0.145			—	

产业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有着较大的抑制作用。OLS回归结果显示,产业扶贫政策的影响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异于零(系数值为-0.306),绝对值仅次于混合型扶贫政策。相比较而言,产业扶贫政策是成本较高的扶贫方式,主要通过农业合作社、入股分红、雇佣农户、种养补贴等方式为脱贫农户提供了更多的拓业增收途径。反过来,已从产业扶贫项目中获取红利的脱贫户,也能够为产业扶贫政策的深入实施以及满足脱贫农户劳动供给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种良性循环有助于减少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问题。考虑到产业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有较大程度的影响,政府应扎实推进和稳健实施产业扶贫政策,不断巩固稳定脱贫基础。一方面要持续拓宽脱贫农户受益面,通过产业联农带贫机制,提升脱贫群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受益程度;另一方面尝试实践一村一品,充分结合要素禀赋、产业市场变化,因地制宜地推进产业升级与深度融合。

教育扶贫政策的影响效果尚不显著。原因大抵在于,尽管政府深入民族贫困地区并充分联系农户

<sup>①</sup>方差膨胀因子较大代表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一般经验规则认为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的指标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

贫困实际，凭借党的政治优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精准教育扶贫实践，但教育扶贫是一个兼具阶段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较短时期的政策强刺激并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与此同时，其他精准扶贫政策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对教育扶贫政策产生了挤出效应。在教育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帮扶与农户需求脱节或脱靶现象时有发生，教育扶贫资金指向不明、帮扶过程执行力不足、政策落实及衔接机制僵化等原因也导致教育扶贫质量不高。政府在巩固拓展教育扶贫政策成果过程中，应关注教育扶贫网络化、智能化，切实把握受帮扶人口的精准信息，有效发挥教育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阻滞作用；尝试构建社区式教育扶贫机制，促使教育任务式扶贫向自主性帮扶转变；给予民族教育更多政策支持，如学校布局规划、师资力量提升和普通话推广等，在民族地区助力乡村教育帮扶，促进教育帮扶者积累更多社会资本。

安居房工程政策的 OLS 回归估计结果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精准扶贫中的安居房工程政策主要采取原址修缮和易地扶贫搬迁的方法，为脱贫农户提供住房保障。该惠民政策通过补贴、奖励以及贷款等方式帮助脱贫群体减轻住房负担，完善其生活设施，筑牢了外部风险冲击的防线，降低了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易地扶贫搬迁大幅提升了脱贫农户的物质资本，重塑了其社会网络结构，其金融资本也随之增加。政府落实安居房工程政策应注重合理规划，将少数民族聚落的历史、建筑与民族文化与安居功能相结合，引入各方力量参与和资金投入；改善农户饮水、用电以及出行安全等基本生活条件，使其享有可及性和便利性的基础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同时秉承生态立村理念，在稳步推进扶贫政策过程中打造良好的住房和人居环境，提高脱贫人口生产生活质量，为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夯实基础。

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较为明显地降低了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在 Logit 回归中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促使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向本人属地以外地区转移实现就业，这种离土离乡转移就业的政策对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过程中，脱贫群体大多流向了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高人力资本通常蕴含更高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从而有利于就业转移农户吸收技术外溢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的较快提高，此谓人力资本强化效应。二是脱贫农户享受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带来最直接的好处是提升了其劳动力的资本收益与报酬。同时转移地区优渥的基础设施条件或较高的公共服务效率会激发脱贫农户的就业积极性，进而强化了劳动力资本回报。这能够缓解脱贫群体要素配置的资金约束，促进脱贫农户收入增加，从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政府实施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首要应厘清劳动力就业需求、意愿和去向，通过查摆问题整改工作台账进行逐户引导。开发公益岗位推荐或托底安置解决就业，同时建立政府专岗平台，让脱贫农户找到稳定就业、长久增收的门路，达到治本的目的。

混合型扶贫政策在两个回归中分别通过了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负且绝对值高于其他扶贫政策。混合型扶贫政策是包括社会帮扶政策、保险扶贫政策、务工交通补贴、土地使用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村级互助政策等多项扶贫政策的有机组合，因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政府出台多种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使部分脱贫农户享受混合型政策的收入占有较高比重。不过这种情况也意味着有些脱贫农户的收入结构还有待优化。民族地区的一些脱贫农户还

需要依靠医疗保障与社会帮扶减少支出，还有些农户需要凭借低保、救助来提供兜底保障。因此，针对脱贫群体实施混合型扶贫政策，应推动民族地区党组织有效部署、传达和输送政策，辖区政府做好政策执行推进工作，基层组织承接政策任务并力保完成。同时积极借助混合型扶贫政策拓宽脱贫农户的精准扶贫参与渠道，摒弃政策实施一刀切的原则，构建完善的脱贫人口受益机制，通过量化落地的办法将政策福利指向性地滴灌到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群体。

上述结论表明，不同扶贫政策的影响效应中，产业扶贫政策、安居房工程政策、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以及混合型扶贫政策的落地与接续实施能够较为有效地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虑及产业扶贫政策的均值（0.17）和劳动力就业转移政策的均值（0.11）还相对较低，且教育扶贫政策的影响效应尚不明显，因此，推进这三个方面扶贫政策实施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及实践意义，尤其是产业扶贫政策应作为政府推进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重点方向。

结合毗邻民族地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国政府应注重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全面激发脱贫群体内生力、加快构建相对贫困治理以及乡村建设扶助机制，紧盯脱贫边缘人口并筑牢防线，促进脱贫攻坚政策实施效果的巩固与拓展。一是建立脱贫户监测回访机制，巩固提升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效能。政府应瞄准相对贫困风险高发地区，强化精准扶贫绩效管理，动态监测脱贫人口尤其是脱贫边缘户的生计脆弱性状态，着力解决后脱贫攻坚过程中消极应付、形式主义等问题。通过强化助贫机构定点帮扶、持续加大精准教育扶贫力度、严格落实脱贫不脱政策以及脱贫人口返贫回查，筑牢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保障。二是营造包容性人居和经济环境，切实提高脱贫群体的福利效应。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进乡村建设的扶助机制，着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领脱贫农户勤劳致富。立足于发展优势主导产业和创新经济合作模式，增加经济组织内部农户收入的多样性。同时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培育地方知名企业吸纳农户就业，构建并完善农村金融支撑体系，让脱贫人口充分享受扶贫政策红利。三是接续推进扶贫政策实施，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中央提出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要求，未来推进扶贫政策实施应逐步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面对战略的重大转向，政府应充分总结和利用多元精准扶贫实施的成功经验，推进民主协商建设以提升扶贫政策执行效果，不断分解和细化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工作衔接机制，城乡联动优化要素配置和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始终保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措施、机制和政策体系上有效衔接。

## 五、结论

本文从理论上讨论了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对理论推断进行了经验验证。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对于脱贫边缘户来说，这种政策抑制效应的影响程度尤为突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制约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强农户收入多样性、强化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增强其发展致富动能等渠道实现的。对扶贫政策的进一步讨论还表明，不同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混合型扶贫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影响程度相对最大，其次是劳动力就业

转移政策和安居房工程政策，短期内教育扶贫政策的影响有限。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是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政策供给，“后 2020”时期接续推进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有助于提高脱贫人口的生计可持续性水平，以及进一步稳固和拓展脱贫攻坚的政策成效。

#### 参考文献

- 1.阿玛蒂亚·森, 2019:《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陈志、丁士军、吴海涛, 2017:《帮扶主体、帮扶措施与帮扶效果研究——基于华中 L 县精准扶贫实绩核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第 10 期。
- 3.丁从明、吴羽佳、秦姝媛、梁甄桥, 2019:《社会信任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基于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的微观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 5 期。
- 4.胡晗、司亚飞、王立剑, 2018:《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 1 期。
- 5.李芳华、张阳阳、郑新业, 2020:《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经济研究》第 8 期。
- 6.李小云、徐进、于乐荣, 2018:《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7.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 2019:《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第 10 期。
- 8.李玉山、陆远权, 2020:《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吗?——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财政研究》第 5 期。
- 9.刘米娜、杜俊荣, 2013:《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 2 期。
- 10.龙彦亦、刘小珉, 2019:《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生计空间”视角解读》,《求索》第 1 期。
- 11.卢敏、邓衡山、李杰, 2011:《相关利益方视角的农民组织认知分析——基于吉林省黄松甸食用菌协会的案例》,《中国农村经济》第 4 期。
- 12.宁静、殷浩栋、汪三贵、王琼, 2018:《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 8 省 16 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 PSM-DID 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11 期。
- 13.王建, 2020:《教育缓解相对贫困的战略与政策思考》,《教育研究》第 11 期。
- 14.王立勇、许明, 2019:《中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统计研究》第 12 期。
- 15.王丽纳、李玉山, 2019:《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分析》,《改革》第 12 期。
- 16.王亚华、舒全峰, 2021:《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实践经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17.王振振、王立剑, 2019:《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基于陕西省 70 个县(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第 4 期。
- 18.王志章、韩佳丽, 2017:《贫困地区多元化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有效减贫吗?》,《中国软科学》第 12 期。

- 19.魏后凯、姜长云、孔祥智、张天佐、李小云, 202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权威专家深度解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 20.温铁军、王茜、罗加铃, 2021: 《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开放时代》第1期。
- 21.吴比、Ziming Li、杨汝岱、彭超, 2016: 《农村政策执行协商会影响农民的政策满意度吗?》,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22.邢成举, 2020: 《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 《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 23.杨文、孙蚌珠、王学龙, 2012: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经济研究》第4期。
- 24.尹志超、郭沛瑶, 2021: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第4期。
- 25.于婷、于法稳, 2019: 《环境规制政策情境下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认知对养殖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 26.左停、赵梦媛、苏青松, 2020: 《聚焦贫困预防: 基于贫困边缘人群和新生贫困人群的对策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第9期。
- 27.Adger, W. N., 2006, "Vulnerabi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3): 268-281.
- 28.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 179-211.
- 29.Banerjee, A. V., Duflo, E., Rachel, G., and Cynthia, K., 2015, "The Miracle of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7(1), 22-53.
- 30.Chaudhuri, S., J. Jalan, and A. Suryahadi, 2002,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or Indones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0102-5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31.Cutler, D. M., Lleras-Muney, A., 2010,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health behaviors by educatio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9(1): 1-28.
- 32.Ellis, R. P., Martins, B., Zhu, W., 2017, "Health Care Demand Elasticities by Type of Service",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55, 232-243.
- 33.Erikson, R., Luttbeg, N., Tedin, K., 1991,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Its Origins, Content, and Impact (4th ed)*. Macmillan: New York.
- 34.Günther, I., and K. Harttgen, 2009, "Estimating Households Vulnerability to Idiosyncratic and Covariate Shocks: A Novel Method Applied in Madagascar", *World Development*, 37(7): 1222-1234.
- 35.Hahn, M. B., Riederer, A. M., and Foster, S. O., 2009,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ssessing Risks from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A Case Study in Mozambiqu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1): 74-88.
- 36.Miller, A., and Listhaug O., 1990,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A Comparison of Norway, Sweden and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0, 20(3): 357-386.
- 37.Wuepper, D., Yesigat, A. H., and Sauer, J., 2018, "Social Capital,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9(2): 458-475.

38.Zhang, Y., and G. Wan, 200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11(2): 196-212.

(作者单位: <sup>1</sup>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sup>2</sup>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  
<sup>3</sup>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责任编辑: 陈静怡)

## **Implementation of Diversifie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Out-of-poverty Farming Household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Adjacent Ethnic Area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Provinces**

LI Yushan LU Min ZHU Bingjie

**Abstract:**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will remain unchang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ivelihoo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armer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ore categor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out-of-poverty farmers in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neighboring ethnic area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multipl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ffect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out-of-poverty farmers on the basis of their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being comprehensively meas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pl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and the impact is greater on marginal households. Diversifie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have reduced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the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mainly through increasing income diversification, improving farmer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enhancing their motivation to get rich.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on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rural households varie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mix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have the most prominent impact, followed by labor employment transfer policies, and then by housing project policies, whil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ut-of-poverty Farm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Policy Effect